

## 义和团武术活动史学价值省思

李信厚<sup>1</sup>,高亮<sup>2</sup>

(1.上海体育学院体育科学研究所,上海200438;2.南京体育学院,江苏南京210014)

**【摘要】**本研究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采用文献研究、逻辑分析、历史学等方法对义和团武术活动的史学价值进行研究,旨在对义和团武术活动的价值进行客观、科学的审视和评判。研究结果如下:①义和团武术活动的三重文化向度表现为:“动以卫国,甘愿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降神附体、喝符念咒”封建迷信思想。②义和团武术活动的史学价值在于: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武术拳术、器械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也促使人们对“武术”认识发生了改变。③义和团武术活动的当代启示在于:汲取经验,破除武术“神秘主义”面纱,促进武术科学化发展;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铸魂,涵养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关键词】**义和团;武术活动;中华武术;武术文化;巫术史

**【中图分类号】**K256.7;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1)06-0070-07

**DOI**:10.15877/j.cnki.nsic.20211117.001

### 1 研究缘起

用史实发言,才能坚守记忆。百年以来,义和团运动是近代武术发展史中的一个鲜明坐标<sup>[1]</sup>,然许多学者曾对其持有完全否定甚至“嗤之以鼻”的态度,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称之为“拳乱”或“拳祸”,通过歪曲事实真相以诋毁义和团武术活动,“更有甚者,断言义和拳者,乃党祸之战争也”<sup>[2]</sup>。伴随着这些质疑的声音,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义和团武术活动史学价值评判存在争议。孙中山先生曾站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角度,明确提出:一方面,义和团拳民表现出愚昧落后的思想即“义和团始终不相信外国的新式武器,总是用大刀和肉体与联军相搏……伤亡枕藉”;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在抵抗西方侵略时所表现出“不畏牺牲”之爱国主义精神为外国人所震撼,“经过此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有民族思想”<sup>[3]</sup>。梁启超则从清政府统治者角度出发,认为义和团武术活动为“拳乱”,在“拳乱”当年,“略知中国古今事故者”不到10万人<sup>[4]</sup>。西方学者狄德满、施坚雅和裴宜理则站在西方国家政治利益和传教士视角,认为义和团武术活动为“拳乱”,原因在于中国华北地区由于资源匮乏,当地人倾向于采取“掠夺性策略”<sup>[5]</sup>。鉴于中西学者对于义和团武术

活动价值评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有必要对义和团武术活动史学价值进行梳理、归纳。

面对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走进历史“在场”,遵循“理性分析—史料依据—学理阐释—结论确证”的研究路径分析可知,众多学者对义和团武术活动价值评判持有“争论”的主要原因在于:一则,义和团拳民习拳练武是“带着封建镣铐的”,确实存在“喝符念咒”“降神附体”等神秘玄虚色彩和封建迷信等糟粕,如史料记载“山东义和团匪,妄自造妖言,煽惑愚民,势焰日炽,蔓延日广”<sup>[2]</sup>;二则,“拳民”主体是文化知识匮乏的“游民阶级,失业的劳动阶级”,思想简单,在神权思想数千年熏陶下,心中认为神能主宰一切,遂假借神灵,拿起“神道”为武器,抗击西方先进的现代枪、炮。如当时的揭帖中说到:“神助拳,义和团……请下各洞诸神仙……附着人体把拳传。……要平鬼子不费难。”<sup>[6]</sup>综上所述,拳民用“神道”对抗西方先进枪、炮等热兵器的做法

收稿日期:2021-08-30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TYA001)。

作者简介:李信厚(1984—),男,山东临沂人,博士,博士后,讲师,研究方向:武术文化和武术历史。

通信作者:高亮(1976—),男,安徽六安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确实非常愚昧与无知。然而客观而言,义和团运动确实改变了中国普通民众对“武术”的认识,义和团武术活动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刚健自强”之民族精神犹如一面一往无前的风帆,支撑起“中华民族精神之船”百年以来不断进步。由此可见,义和团武术活动是一个瑕瑜互见的两面体,既包含家国情怀、爱国主义,也包含封建迷信、愚昧无知。凡此种种,都有着值得挖掘的深刻内蕴。

鉴往以知来,循道以知远。当前,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重点聚焦义和团武术活动组织(陈贵宗,1987;黄少同,2013)和义和团武术活动方式(周伟良,1988;路遥,1990;唐韶军、王美娟,2017;王自强,2017)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义和团武术活动的史学价值问题研究仍然没有得到科学地回答,亟待深入。史学大家瞿林东曾对“史学价值判断”及相关问题进行论述,描述如下:“如荀悦、虞世南、魏征、司马光的君主论,……李百乐、柳宗元的封建论,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天说、天论”,这些都是历史批判意识深入发展的突出表现;“黄宗羲对君权的批判,顾炎武对君主专制主义政体的批判……都是历史观念中从未有过最深刻的批判”<sup>[7]</sup>。瞿林东先生所提出的“历史批荀乐判意识”即为史评。“史学价值判断”表达方式有多样性,至少有明示和隐喻两种。唐君毅先生认为,“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价值判断为应然价值”<sup>[7]</sup>。关于“史学价值评判”的具体研究内容,他提出:一则,考订史实;二则,客观叙述史实及其隐藏的内容;三则,彰显藉著价值即史料文献中“真值”通过语言逻辑分析来发现<sup>[7]</sup>。笔者以此“史学价值评判”理论作为立论基础,针对目前研究存在的一些缺口,试图重点补充、归纳和梳理义和团武术活动的史学价值,旨在对义和团武术活动史学价值做出客观的梳理、评判。本研究对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武术文化,提高文化自信,培根铸魂,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2 义和团武术活动的三重文化向度

### 2.1 文化之要:动以卫国,甘愿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

义和团武术活动“文化之要”可凝练为“动以卫国,甘愿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为强烈的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彼时中国“国力茶弱,武风不振,

中国人民处于水火之中”,为挽救民族之沉沦,救民众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sup>[8]</sup>,义和团拳民将忠义爱国思想表现得实实在在,拳民以血肉之躯与武装到牙齿的外国士兵殊死搏斗的行动是有口皆碑的。《八国联军目击记》中记载了天津火车站一段战事场面:“每一次齐射之后……溃散了,拳民仍然高喊义和拳……大旗倒下了,又举起来了”<sup>[9]</sup>“死者如风驱草……尚不畏死”<sup>[10]</sup>。义和团拳民作为一个爱国的民众群体,勇敢作战,前赴后继,不惜牺牲生命,为国捐躯,抵抗侵略,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星星之火”感动着亿万同胞,在近代反抗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进程中得以“燎原”。义和团拳民把自身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将自己的人生融入实现民族独立、民族复兴的伟大洪流中,“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广大义和团拳民以身报国的立德之本。

### 2.2 文化之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义和团武术活动“文化之魂”可以表述为“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之民族精神。历史实践证明,武术是塑造“刚健自强”精神的有效实践途径。武术的本质是攻防技击,通过磨炼技艺,一方面,习武者逐渐趋近“技击之道”;另一方面,人们在对抗中切实体会生命挑战,培养、体悟刚健自强之“勇武”精神。古人云:“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种“刚健自强”民族精神对于启迪习武者思想、陶冶习武者情操、温润习武者的心灵具有重要作用,可以实现“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目的。反思历史,客观而言,义和团拳民在“神道主义思想”汇聚下,手持阴阳瓶、如意钩、飞剑、大刀勇敢地对抗八国联军的花炮、快枪时,由愚昧升华为悲剧,但是他们在与八国联军战斗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凛然节气与“刚健自强”之民族精神,感动和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国家民族复兴拼搏进取、积极有为。历史照亮未来路,征途正未有穷时。义和团武术活动中表现出来之爱国主义精神和“刚健自强”民族精神跨越时空产生“共鸣”,使中华优秀传统武术文化血脉赓续、薪火相传。

### 2.3 文化之粕:“降神附体、喝符念咒”封建迷信思想

义和团武术活动文化糟粕具体表现为“降神附体”“喝符念咒”<sup>[11]</sup>“武神文化崇拜”等“神秘主义”

迷信。企图借助“神佛”的能力使外国侵略者的攻击武器失去作用<sup>[12]</sup>。然“降神附体”“喝符念咒”，在战场上并不能抵御列强联军的洋枪扫射，这些热兵器直接导致义和团拳民的刀枪不入、踏雪无痕、飞檐走壁等神功绝技现了原形，“死者如风驱草”，封建蒙昧主义使这场运动付出了沉痛代价。客观而言，义和团武术活动过程中处处体现出“巫武结合”的特色，也造就了“刀枪不入”“能避炮火”的武术神话，致使下层民众对传统武术产生了误读，此后的一段时间，中华传统武术在民间的传播、发展陷入了低沉期。

### 3 义和团武术活动的历史价值质思

#### 3.1 促进了中华传统武术拳术、器械在民间的广泛传播

历史之中有借鉴和启示。清初，为打击“反清复明”之力量，清廷实施了极为严酷的“禁武”令。当时清政府更惧怕宗教与武术结合，所以宁可禁止骑马射箭，也要禁止民间拳棒，特别是对与宗教结合的聚众练武，仍然严行禁止，且从重处罚。因此，义和团运动之前，中华武术拳术、器械传播呈“零星”状态，没有形成一定规模。与之比较，义和团运动早期，义和团组织设“坛”习拳练武是公开的，且得到政府支持。正因此，习练武术的“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华北大地出现了拳场林立、拳师云集的局面，民众习武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武术拳术、器械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史料记载：“直鲁交界各州县地，民强好武，民平居多习练拳技，各保身家，守望相助……”<sup>[13]</sup>综合而论，“习拳练武”成为义和团组织的鲜明特征，参加义和团运动的人数之众多、范围之广，以及各级政府官员对义和团运动的支持等“全民皆团”现象对中华武术在北方地区的传播产生了积极有效地影响。义和团基层习武组织为“坛”。“坛”建立以后，通过义和团组织传单、揭贴等相互传递信息，互相沟通、协同联络，通过“坛”纠集“拳民”，“传习武技，习练武艺”。义和团组织拳民习练武艺呈现多样化特点，拳民武术活动传播内容主要表现为拳术套路、器械和功法等。

首先，拳术套路是义和团武术活动传播的重要内容，各类史料中的相关记载较多。然义和团组织中传习的拳法套路具体为何，尚缺乏详实考证的学

术观点予以论证说明。有学者曾经提出义和团的拳术以两种形式存在：一是，拳“坛”中降神附体以后的徒手表演；二是，运用实战的功夫<sup>[12]</sup>。笔者通过借鉴前面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依据中国人民大学陆景琪、程歊先生编纂的《义和团源流史料》一书中记录总结梳理可知，义和团组织中习练的拳术有梅花拳、义和拳、金钟罩、太子(祖)拳等拳种。另有研究指出：义和团习练的拳种“有聊城地区赵三多传习的梅花拳，冠县闫书勤传授的红拳<sup>[14]</sup>(图1)，菏泽大刀会习练的金钟罩，心诚和尚在茌平县城传授的少林拳，临清县城一带流传的华拳<sup>[15]</sup>。其中最吸引拳民习练的武术拳种是金钟罩和梅花拳。目前，这些拳种有些还在民间流传，得到较好的传承与延续，有些拳术则和其他拳术融合，还有一些拳种在历史的尘埃中消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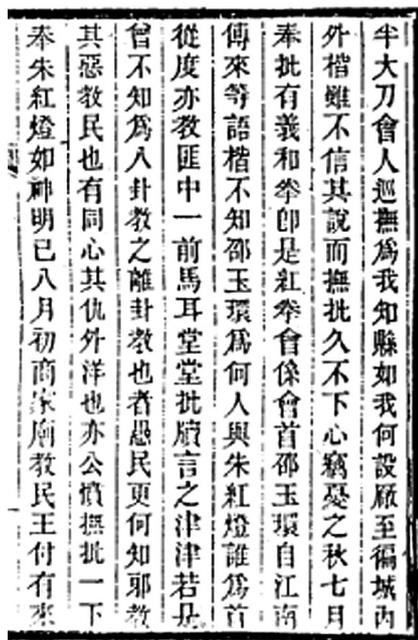


图1 清刻本《庚子国变记》中关于红拳记载<sup>[15]</sup>

Fig1. The story of red Fist in gengzi Kingdom Transformation in Qing Dynasty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基本古籍库中清代版本《庚子国变记》。

其次，义和团拳民们与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主要凭借传统冷兵器<sup>[16]</sup>。义和团武术活动中，拳民习拳练艺的具体器械曾经引起学界重点关注，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认为：“拳民习武的器械主要有刀、枪、剑、棍、鞭等”<sup>[17]</sup>。这一学术观点为武术学界所认同，并且与史学界路遥、程歊等学者提出的学术观点相一致。关于义和团拳民习练“拳棒”的纪录，在《义和团源流考》中也有相关记载：“义和

拳乃白莲教支流,教义以拳棒为由,托言降神附体,讲道授拳。”<sup>[18]</sup>史料中“棒”即棍,说明棍是义和团拳民习练的重要武术器械之一。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厘清拳民习练的棍法套路有哪些。由于“棍术”套路所存史料和实物遗存较少,考证起来难度较大,因此,学界学术观点各异。其中,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有:其一,义和团运动时期,拳民习练的棍法套路有阴手琵琶棍、蟠龙棍、大疯魔棍等;其二,义和团运动时期山东一些地方拳民“恒执木棍”,习练“二郎神棍”。基于此,笔者认为蟠龙棍、阴手琵琶棍、二郎神棍皆是这一时期流行的棍术器械套路。另外,除了几种“棍”套路之外,拳民还习练其他器械,如刀法和鞭法。周伟良提出,刀是义和团武术活动的主要器械,主要有腰刀、长刀、短刀等。《拳匪见闻录》记载:“有持大刀乱舞者,数人持枪刀鱼贯而行,有乘马而拥道者。”<sup>[19]</sup>除了刀法,义和团拳民习练的器械,还有绳鞭、七节鞭等。史料记载:“直隶南宫县人魏玉凯供称,乡约李存仁和魏学宗等从前系白莲邪教”“后又改为义和拳,各人俱藏有绳鞭。”<sup>[20]</sup>承前所述,义和团拳民习拳练艺的过程中,器械具有多样性特点,习练较多的器械有刀、枪、棍、鞭等。

### 3.2 “传统武术”在民间下移,促使人们对“武术”认识改变

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明清以降,火器的增多、火力的加大,使国家军队中军事冷兵器技术的威力大打折扣,此时作为中国古代冷兵器技术的“武术”开始大规模地向民间转移。依据专家考证和现有文献记载,最迟在清末,下移民间的这种军事冷兵器技术开始被人称之为“武术”。如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离圆明园不远处谢庄的冯婉贞就“自幼好武术”,且“习无不精”<sup>[21]</sup>。随后,“武术”下移民间的情况经武举制的废除、义和团运动的暴发以及体育救国思潮的兴起等3个重大历史事件后被进一步社会化,尤其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勃兴,武术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sup>[22]</sup>。

首先,民众对武术“防身自卫”价值认同增强。在农耕时代,上至军国大事,下至黎民百姓,为小团体或个人利益而进行的格斗,都离不开武术。因此,“在那个时代武术是国家,以及个人自卫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sup>[21]</sup>。义和团运动时期,严重的民族危机导致社会动荡与灾害频仍,使得广大农民处于一

种极不安定的生活环境中。因此,“农民们纷纷集结起来开展武术活动……为了‘遇事相帮,免人欺凌’,改变自己孤立无援困境。”<sup>[23]</sup>其次,武术“民俗医疗健身”价值为民众所接受。义和团武术活动中,常用的医疗方式主要有“喝符念咒、做功运气、祈福静养”<sup>[16]</sup>。其中,符咒疗法带有明显的巫术性质,其作用类似医学心理疗法,这种疗法在平民社会中有颇高的接受度。原因在于:一则,贫民身处“缺医少药、文化闭塞”的环境,就医途径选择不多;当患者耳闻或亲见疗法之疗效时,对符咒的神力就颇为信服,能强化普通民众求医的心愿。二则,传统武术在训练实践中,必然会涉及大量诸如人体生理、损伤、康复及相关药理等方面知识,作为个人练功的心法和强健体魄的重要依据<sup>[24]</sup>,此所谓“武医相融”。习武者在“一个拳师半个医”传统道德律令下,处于自身角色位置对社会发出的日常关怀,就是要求习武者能利用自己的医疗知识技能为广大民间疗疾治病,以实现“拯黎元”“济羸劣”的目标。另外,拳民通过习拳练艺,可以成为乡村“武术能人”和社会精英,从而获得大家尊重,争取“隐形权力”。晚清乡村由于政府对地方控制力较弱,县级往下的社会管理主要依靠社会精英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政府对乡村治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绅士,地方绅士为使管理职责顺利实施,不得不“求助于处于体制外的武师及其主导的拳会”<sup>[25]</sup>。因此,乡民遇到矛盾纠纷时,习惯请村里的能人和“精英”出面调解。这种乡村“精英”或“能人”,凭借自身“隐权力”在村里行使话语权。这种“隐权力”“主要通过个人威望、武艺水平、财富和社会影响力等因素累积而成。”<sup>[26]</sup>

## 4 义和团武术活动的当代启示

### 4.1 汲取经验,破除武术“神秘主义”面纱,促进武术科学化发展

历史之中有启示和借鉴。现阶段,对义和团武术活动进行重新考量,有利于经验升华、正本清源,破除武术“神秘”主义面纱。按照马克思“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的认识路线,只有认真了解义和团武术活动何所来,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义和团武术活动的历史价值精髓。回溯历史,清末义和团组织借助“喝符念咒”“降神附体”等神秘主义力量,通过“坛”“场”等小组组织结构,构

建“熟人社会”，组织民众集体习拳练武，以此来满足下层人民“保卫身家”“守望相助”的需求。在这个组织过程中，封建蒙昧主义得到了最为集中、典型的暴露。义和团运动的失败，直接导致很多仁人志士和爱国民众清醒地认识到刀、斧、棍、棒等冷兵器无用，遂呐喊“请停弓马刀石武试”。武举制的废除以及晚清政府对民间习拳练艺的限制，直接导致武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陷入低谷。而义和团武术活动中的武术文化糟粕，也严重阻碍了武术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当前，社会中披着“神秘主义”面纱的“伪武功大师”和“隔山打牛”奇功、“刀枪不入”神功再次重现，而这些“伪武功大师”在与其他格斗项目专业运动员对抗时却一败涂地，这也将传统武术再次推向了民众舆论的风口浪尖，代表性事件是闫芳的太极拳事件、雷雷的太极神功表演及与徐晓冬的约架事件。这些披着“神秘主义”面纱的“伪武功大师”和“隔山打牛”奇功、“刀枪不入”神功重现的原因，其本源可以追溯到清末义和团“神秘主义”武术活动。针对此问题，笔者探求行之有效的中华传统武术“面壁突破”的具体方略。

首先，应揭掉传统武术的“神秘面纱”，继续推进中华武术的科学化进程。紧扣技击本质而传承，这才是传统武术传承的“定海神针”。“技击实战”是传统武术的灵魂，抓住了“技击实战”本质，就抓住了牵动传统武术发展的牛鼻子。其实，对于传统武术科学化的探索始自民国中央国术馆的武术比赛，而现代竞技武术散打运动则开辟了一条以实战对抗为目标的武术新技术体系，这种新实战技术一经问世，遇到了很多传统武术习练者挑战，但这些挑战者皆以失败告终，印证了“神秘主义”笼罩下的传统武术技击存在的问题<sup>[27]</sup>。毋庸置疑，竞技武术散打运动确实给武术发展带了一片生机。然近年来，很多传统武术习练者质疑竞技武术散打为“拳击加腿”，并不是中华武术；而竞技武术散打专业人士则质疑大成拳、太极拳、形意拳无法运用于技击实战。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散打陷入了水火不相容的境地。客观而言，中华传统武术本质应该“技击实战”，否则，不会出现击败大力士的蔡龙云，“半步崩拳打天下”形意拳大师郭云深，当代也不会出现继承、创新与融合太极、形意、八卦、螳螂等技击实战精华为

一体的姜周存。竞技武术散打运动的先进之处源于其倡导紧紧抓住中华武术的最原始“核心技法”，这些武术技法形成可以直接应用于实战格斗，从而导致那些徘徊在技击实战圈外围的传统武术拳师败北。鉴于此，传统武术的科学化应该“去伪存真”，充分挖掘各种传统武术拳种技击精华，形成系统、规范的技术体系，使不同层次技击术得以呈现。

其次，保持中国传统武术民族特性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吸收借鉴与创造性转化，尽快实现现代化转型，完成文明跨越，将具有不同特色的传统拳种技艺实战改造成为不同竞赛规则指导下的对抗游戏，步入文明化行列，这是传统武术传承、延续的“力量源泉”。对于传统武术的现代化转型，杨建营曾提出：“传统武术技艺需要提炼核心技法，武术对抗性项目尽快实现由实用型向安全保障型竞赛项目跨越，紧紧把握‘以武会友’，开辟人类武技文明化技艺交流的新方向。”<sup>[28]</sup>除了提炼中华武术核心技法之外，国家相关管理部门也应该积极出台相应政策、法规和制度，组织专家研究、论证和完善传统武术实战竞赛体系，将传统武术的核心技法在竞赛中表现出来，这样传统武术才能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尽快完成现代化转型。再次，中华传统武术具有自身的文化生成规律、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其展示出“厚德载物、刚健自强”的民族精神以及彬彬有礼的竞争意识等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标识都与西方竞技体育有着本质区别。因此，不能盲目地将西方竞技体育的商业化、资本化、竞技化等发展模式强行“移植”到传统武术发展中来，虽然中华传统武术不能固步自封，应该兼收并蓄、与时俱进，但只有坚持住中国传统武术最本真的面貌，使传统武术习练者时刻铭记自己的习武初心，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刚健自强、厚德载物”精神作为砥砺品格的精神熔炉<sup>[29]</sup>，厚植“尚武崇德”情怀，才能保持“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秀品质。只有在这种传承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实现中国传统武术、中华优秀传统武术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 4.2 牢铸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铸魂，涵养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习近平指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sup>[30]</sup>基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凝练、弘扬和传承义和团武术活动中所彰显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刚健自强”之民族精神,对于人民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铸魂,涵养中华传统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国家强。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帝国主义列强的频频侵略,致使国人民族自信心严重不足,缺乏应有的民族文化自信,甚至出现“全盘西化论”的极端论调。正如毛泽东所言,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然义和团拳民习拳练武抵抗西方侵略时所展现出的“动以卫国、甘愿牺牲”爱国主义精神和“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铸忠魂”之民族主义精神,感动着亿万中国人,犹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中华民族赢得民族独立的道路;恰似大海里的航标,指引中华民族解放前进的方向。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仍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压与买办文化侵蚀等,甚至一度出现使国人丧失对自己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应有的重视和尊重、造成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断裂的危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sup>[30]</sup>。当今中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交汇的特殊历史时期,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亟需提升包括文化自信在内的民族自信心,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则是保证中国能够继续长期稳定发展、实现“中国梦”的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当前,在学校教育中,体育教育重视度不高、民族精神出现涣散的局面下,需要将义和团拳民习拳练艺抵抗外国侵略时所展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刚健自强民族精神”贯穿于日常生活、学习、工作、教育的始终,筑牢“中国之治”的精神根基,将其作为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和实践要求。

新时代,应以武振魂,充分发挥武术文化“立德树人”的教育价值,突出强调武术培育“刚健自强”民族精神的特殊价值。秉持“立德树人”前提下“成才”,鼓励“成才”基础上成功<sup>[31]</sup>。倡导育人与育才相统一。教育应该紧紧围绕培育和践行“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而展开,以实现“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认同为落脚点,力争使学生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学生自觉的行为习惯,以此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激发广大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形成强大的民

族凝聚力,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 5 结语

鉴往知来,以史致用。义和团武术活动是一个瑕瑜互见的两面体,以“动以卫国、甘愿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文化之要”,以“刚健自强的民族精神”为“文化之魂”,而封建迷信、愚昧无知则是文化糟粕。面对新时代打开的全新场景,传统武术的传承与发展,一方面,需要改变“秘而不宣”的“神秘面纱”和扬弃“伪武术大师”所提倡的“神功”“绝技”,继续尚未完成的科学化之路,紧扣“技击本质”,保持中国传统武术的民族特性基础上,充分吸收现代体育科学,尽快实现传统武术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需要凝练、传承和弘扬义和团武术活动中所彰显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刚健自强”之民族精神,这对于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铸魂,涵养中华传统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

## 参考文献:

- [1] 周伟良.义和团武术活动简探[J].北京体育学院学报,1988(2):80-86.
- [2]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59.
- [3] 孙中山.党义义和团[N].中央日报,1930-12-13.
- [4] 汪林茂.晚清文化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5] 姚斌.西方义和团研究的新趋势——评《拳民、中国与世界》[J].清史研究,2012(2):150-156.
- [6] 杨祥全.武术概念之源流变迁考证[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2):249-251.
- [7] 唐兆强.唐君毅先生(1909—1978)的史学价值判断论[J].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007(39):55-73.
- [8]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 [9] 李印东.武术释义:武术本质及功能价值体系阐释[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
- [10] 路云亭.民间武术文化对直、东义和团事件的催生[J].体育科学,2012,32(6):90-97.
- [11] 马建泽,李彤.瑶医神气道学术体系“巫医文化”内涵浅析[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8,27(22):5-8.
- [12]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 [13] 路遥.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M].济南:齐鲁书社,1980.
- [14] 杨建营.从20世纪武术的演进历程探讨其发展趋向[J].体育科学,2005,25(7):53-58.
- [15] 中国历史研究.庚子国变记[M].上海:上海书店印行,1982.

- [16] 佐藤公彦,宋军,彭曦,等.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国民众Nationalism的诞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17] 李成银.山东传统武术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9.
- [18] 寥一中,李德,张旋.义和团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9]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0]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1] 杨祥全.中国武术:一个观念的历史形成[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2,27(2):143-147.
- [22] 温力.中国武术概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 [23] 杨祥全,杨向东.武术体育思想史简论[J].体育文化导刊,2009(2):92-94.
- [24] 路遥,程歆.义和团运动史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8.
- [25] 张岩.行动的逻辑:意义及限度——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的评析[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1):28-32.
- [26] STOVER L E.The cultural ecolog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easants and elites in the last of the agrarian states [M].Pica Press, Distributed by Universe Press, 1974.
- [27] 温力.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和武术运动的综合创造[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6(4):85-88.
- [28] 杨建营.以“扣子论”为切入点的新时代中华武术发展改革定位[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44(1):145-156.
- [29] 杨建营.基于民族复兴目标的武术教育之价值定位:培育刚健自强精神[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1,36(4):293-299.
- [30]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党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31] 麻晨俊,汤卫东,高亮.中央国术馆武术教学模式及启示[J].体育学研究,2021,35(2):58-65.

作者贡献声明:

李信厚:调研文献,收集资料,论文撰写、修改;高亮:提出论文选题,设计论文框架,指导修改论文。

##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Wushu Activities of Society of Righteousness and Harmony

LI Xinhou<sup>1</sup>, GAO Liang<sup>2</sup>

(1. *Innovation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Sports, Exercise and Health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Nanjing Sport Institute, Nanjing 210014,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logical analysis and historic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historic value of the Wushu activities of Yihetuan (Society of Righteousness and Harmo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The purpose is to objectively and scientifically examine and evaluate the historic value of the Wushu activities of Yihetua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①The thre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Yihetuan's Wushu activities includes: The patriotic spirit of "moving to defend the country and willing to sacrifice", The national spirit of "vigorous and promising, self-improvement", and the feudal superstitious thought of "praying to be possessed and placing spells". ②The historic value of the Wushu activities of Yihetuan lies in promoting the wide spread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Wushu and the instruments among the people, and also promoting the change of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Wushu. ③The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the Wushu activities of Yihetuan lies in: gaining experiences, disclosing the mysterious facet of Wushu, and facilitating its scientific development;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nurturing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cultivating the confidence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Society of Righteousness and Harmony; Wushu activities; Chinese martial arts; martial arts culture; history of witchcraft